

鳳凰網 讀書
book.ifeng.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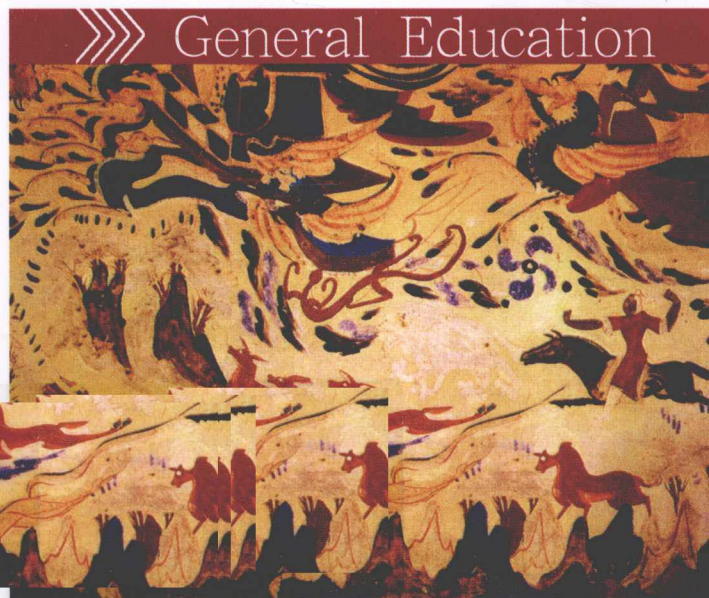
郑重推荐

大学生 GE阅读

(第6辑)

王晓纯 吴晚云 ◆ 主编

张 鸣
革命：摇晃的中国
刘军宁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顾 彬
最后的歌吟已远逝
曹保印
梦开始的时候总是一样的
史仲文
关于位序论的发散性思考
邵 建
《新青年》批判（之二）
吴祚来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蔡登山
从高峰到谷底
柴 静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鳳凰網 讀書
book.ifeng.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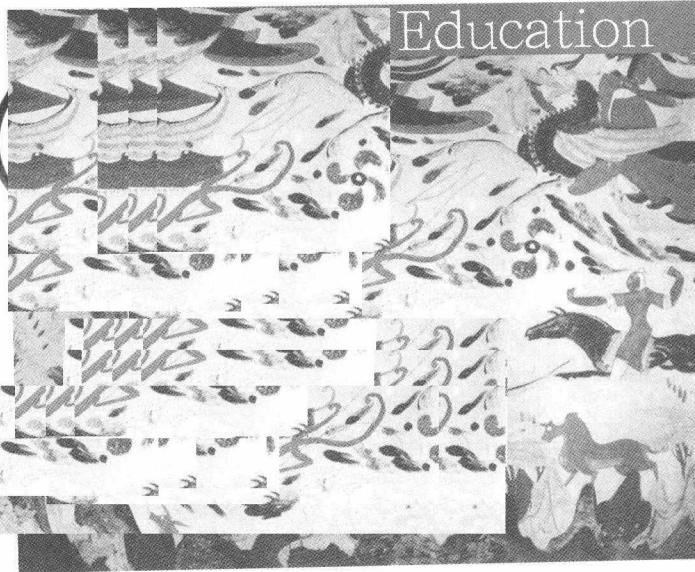
郑重推荐

大学生 GE阅读

(第6辑)

王晓纯 吴晚云 ◆ 主编

张 鸣
革命：摇晃的中国
刘军宁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顾 彬
最后的歌吟已远逝
曹保印
梦开始的时候总是一样的
史仲文
关于位序论的发散性思考
邵 建
《新青年》批判（之二）
吴祚来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蔡登山
从高峰到谷底
柴 静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 GE 阅读(第6辑)/王晓纯,吴晚云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3
(通识教育丛书)

ISBN 978 - 7 - 5657 - 0162 - 7

I. ①大… II. ①王… ②吴… III. ①社会科学—青年读物 IV. ①C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8929 号

大学生 GE 阅读(第6辑)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 mm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57 - 0162 - 7/C · 016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大学讲堂

- 踏平坎坷 成人成才 杨叔子(3)
- 革命:摇晃的中国 张鸣(11)
- 孟子思想与当今社会生活 张加才(18)
- 我们的人文教育究竟缺少什么? 葛桂录(28)

专题专论

- 关于位序论的发散性思考 史仲文(45)
- 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单纯(64)
- 论中国古代草木文化之特征及优缺点 李珺平(75)
-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刘军宁(88)
- 《新青年》批判(之二) 邵建(94)
- 亚非作家会议:20 世纪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的高潮 黎跃进(101)
- 河北佛教简论(外一篇) 张志军(109)
-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吴祚来(116)
- “民间写作”:一种想象性的理论言说 曾繁亭(118)
- 一切都是幻觉
——多元化的存在、拼贴与解构实验 赵强(127)
- 论“非暴力”的力量 刘青汉(138)



2 目 录

福柯的知识权力之旅(下篇)	周勇(150)
中国教育的正路:停止折腾,回归本业	福洛肯(166)
对自己好点儿	闻章(169)
文学与生命超越	孟湘(178)
在洞穴中相遇:法律与文学	刘东辉(184)
主题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相关概念	王立(188)
中伊起源神话:概览·解读·覃析	王燕(201)
由罗振玉书法引起的若干思考	叶培贵(211)
独具特色的韩国端午祭	王鹏(215)
管理的广义解读	史建智(219)

评书评人评事

最后的歌吟已远逝

——祭张枣(1962—2010)

顾彬(227)

谈谈纪伯伦

仲跻昆(230)

从高峰到谷底

——也谈张资平

蔡登山(234)

梦开始的时候总是一样的

——梁从诚和“自然之友”的故事

曹保印(240)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柴静(245)

莎翁的目光穿透时空

骆爽(248)

渴望生活

——关于卡夫卡

张文举(252)

纪伯伦“民族主义者”身份献疑

王鸿博(256)

厚描与生成:《印象·刘三姐》的审美文化分析

麦永雄(264)

在良知的天平上

——读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王俊(276)

《强盗》与现代性

王志宏(289)

波斯《列王纪》及其中国想象

张爱民(294)

解读《边城》的几个关键词

周宝东(302)

《红玫瑰与白玫瑰》:小说、电影、话剧

许波(307)



读者回馈

因悦读而阅读

——从我的阅读史来看通识教育兼评《大学生 GE 阅读》…………… 吴艳玲(313)

众里寻他千百度

——读《大学生 GE 阅读》(第 5 辑)…………… 王阳(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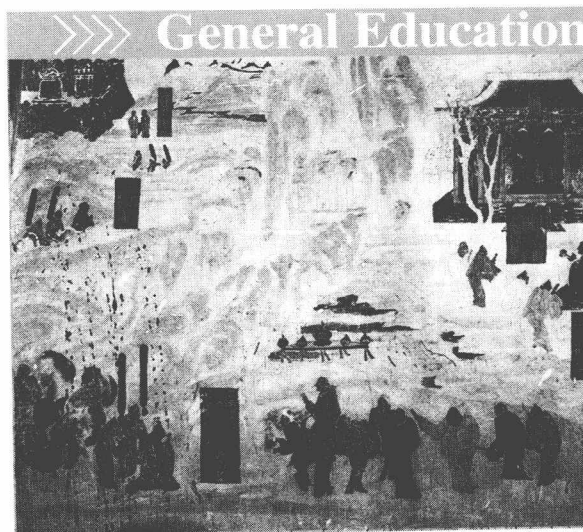
大学讲堂

踏平坎坷 成人成才

革命：摇晃的中国

孟子思想与当今社会生活

我们的人文教育究竟缺少什么？





踏平坎坷 成人成才^①

杨叔子

我想,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献给大家,是一件愉快的事。人生的最大快乐,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最大快乐,就是把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所知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精神财富传给我们青年一代,使其在青年一代中发扬光大。

我个人能成长起来,当然,也有个人的因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人生在勤,贵在坚持

基础因素是:人生在勤,贵在坚持。离开这个基础,其他任何因素都不可能存在。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需三个基本条件:天资、机遇和环境、勤奋。这三者缺一不可。我承认一个人有天资,父母遗传的基因十分重要。一个白痴能够上大学吗?能正常学习吗?一个瞎子能画画吗?一个聋子,能够成为大音乐家吗?除了特例外,这是不可能的事。大家能够走进大学来,可以说天资没有什么问题。二是机遇和环境,同学们现在不存在机遇与环境问题。学校里有许多规章制度,每年都会处分部分学生,不是学校不给他们学习机会,而是他们不好好学习,处分就是为了教育他们,给他们机遇,要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大家的机遇非常好,不同于抗战时期,要救亡图存;也不同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同学要“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甚至不同于五六十年代,那时还有“左”的路线在干扰,弄不好,讲你走白专道路,搞修正主义。现在的一切是希望你们好好学习。第三是勤奋。勤奋是极为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成功的基础因素。有人讲得好,天才是99%的血汗加上1%的灵感。爱迪生就是这么讲的。业精于勤!汉代张衡讲得多深刻:“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不勤奋努力去求索,去探索,去追索,哪会有什么收获?

当我5岁还不到,抗日战争爆发,我随父亲逃难,没有机会念小学,就在父亲手下

① 本文系杨叔子院士2010年4月19日做客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素质大讲堂的演讲稿。原稿题名《理想崇高,志于成人》,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3卷),现做了删改。



念中国的古书，一直念到快9岁。那时同外界接触很少，不了解科学技术，9岁时连钟都不会看，弄不清几点几分。后来逃难到了江西黎川，入高小学习。当时小学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两年。高小一开始，是复习初小的课程，进去以后，语文不存在什么问题，呱呱叫；历史也不错，叫呱呱；地理、生物也只需使劲背，不存在多大问题。最难的就是数学，我从没接触过数学。特别是弄不清除法，每次考试只有几分、十几分。怎么办呢？当然，也有“办法”，作点弊，就至少可及格了。但这行吗？不行！前面我讲过，我读过很多的古书。孔子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弊者，大大的非礼也，而非礼者，即小人也。我不能做小人，我要做君子，正视危坐，目不斜视，不搞非礼。平时作业，问别人行不行？孔子又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对除法一点思路都没有，怎能去问别人？最基本的东西，我一定要自己搞懂。考试分数很低，这不好，但我绝不抄袭别人的。我该怎么办？传统文化熏陶了我，有办法。《论语》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庸》讲：“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我相信这两条，也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够搞懂。中国有句俗话，叫“八岁九岁狗都嫌”。我9岁时也是一样，太调皮了，不过在调皮玩耍之中，仍然想着29除以7，为什么上4。两三个月后，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通了，从梦中醒来，叫道：“我懂了！我懂了！”哥哥问：“你懂了什么？”我讲：“我懂了除法！”哥哥问：“懂了除法什么？”我讲，原来除法就是“试试看”。29除以7，上1，有多；上2，有多；上3，还有多；上4，余1；上5，就不够除了。所以上4余1。除法，就是这么回事！哥哥说：“对啊！就是试试看！”过去，为什么其他同学想到了，而我却没有想到？我发现两条原因：第一，别人从5岁左右上小学起，就天天做数学，而我却在背子曰诗云；第二，别人把乘法表背得很熟，而我把子曰诗云背得很熟，乘法表却背不出来。想通了这个道理后，我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到初二时就能解高二的数学题了。因为我懂得一定要动脑筋，要深入思考。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想透彻，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了解它的物理概念，也要了解它的数学概念；既要有血有肉，形象具体，又要高度抽象，概念清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的数学进步非常快，物理、化学也是如此。念了一年小学，我就跳入了初中。

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1只鸡加1只鸡等于2只鸡，1只鸭加1只鸭等于2只鸭。可是1只鸡加1只鸭等于什么呢？你们会讲，量纲不一致，不能加。这样讲，当然对。我小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大朋友，是高中生吧，问一位小朋友，是幼儿园的吧，“1只鸡加1只鸭是多少？”小朋友讲：“两只，两只……”大朋友笑了起来，告诉小朋友：“不能加！”怎么不能加？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讲：“可以加！”“加起来是什么？”“是两只家禽！”我还讲：“照你的讲法，1只鸡还不能加1只鸡呢！”“为什么？”“请问1只公鸡加1只母鸡，1只大鸡加1只小鸡，等于什么？”当时，我还不知道



什么个性、共性、特殊、一般这些概念；当然，也不知什么量纲、因次。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仔细思考，也会有新的发现，问题可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去认识，知识后面还有知识。不管学什么，只要刻苦专心，总能学好的。我本科毕业留校后到哈工大进修，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俄文太差。尽管读大学时在班上，我的俄文靠“自学成才”吧，算最好的，可是一到哈工大，情况怎么样呢？大家知道，哈工大是苏联帮忙办的，苏联专家那么多，大学五年，先还念一年预科，我的俄文水平哪比得上。别人1小时看七八面到二十几面，我只能看上七八行。怎么办？“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下决心干！自己刻苦专心学习！有一次，我去邮局寄信，边走边念俄文，到邮局以后，把“信”投进邮筒。回到宿舍后，同寝室的进修教师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才发现信还在口袋里，至于向邮筒里到底投进了什么，天知道！三个月，俄文差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在工厂，甚至苏联专家的翻译不知道的俄文专业单词，我都知道。

我认为，只要你专心钻研进去，潜力是非常大的。老天爷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大脑、神经系统、感官系统。在大庭广众之中，如你只想看某人表情，其他人的形象你就可视而不见；如只想听某人讲话，其他人的声音你就可听而不闻。人的感官、神经、大脑能把你不关心的形象、声音等“噪声”淘汰去，“滤”掉，只剩下你们关心的有用信息。这就要求我们“专心”、“用心”，千万不要像《孟子》所批评的那样，“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索而射之”。这样一“分心”，思想开小差，怎么能算真正的勤奋？我认为勤奋包括三个方面：勤奋地学习，勤奋地思考，勤奋地实践，并且加上“专心”、“用心”，把三者结合起来。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非常好，四句话，极为精辟，“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讲的就是这三者。我讲过，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专心是保证；这样，才可能“志于成人”。

勤奋，要长期勤奋，要“十年磨一剑”，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仅靠短期勤奋是不够的，贵在坚持。唐僧取经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坚持下来了。我非常喜欢看电视剧，但真正从头到尾看完了的就只有《西游记》。我觉得它的主题歌写得好：“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踏平坎坷成大道。”唐僧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归真，才能取到真经回长安。当他拿到真经，还只经历八十难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算，不对，还少了一难，不算功德圆满，所以又加上了东渡通天河沉水一难。不吃得苦中苦，哪能磨炼得出来？《孟子》讲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可“增益其所不能”。活到老，学到老。青年时期是最富活力的，是最可贵的，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一直坚持下去，只有如此做，才可能成功。我常告诫同学们，今天自己给自己多找一些麻烦，给自己多找一些被动，给自己多增加一些压力，一定会转变为未来的主动；反过来，超过一定的限度，今天多潇洒一些，多主动一些，多轻松一些，必然会转变为未来的被动。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我们学校那么些参天大树,是哪一年种的?不是一年种的,是建校后每年种下的小树苗,年年长,季季长,月月长,天天长,时时长,分分长,秒秒长,不停地长,才长成参天大树。别人问我:“听说你们夫妇两人吃了30年食堂,有无此事?”我讲:“确有此事!”是的,我1956年毕业,我夫人1957年毕业,吃食堂一直吃到1986年我唯一的一个孩子结婚为止。为什么如此?就是为了节省些时间,好学习,好思考,好实践。我得声明,逆定理不一定成立,吃食堂不一定节省时间,节省时间不一定非吃食堂不可。问题在于自己要惜阴如金,要会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生活,要争分夺秒,珍分惜秒,持之以恒。

二、敢于创新,善于总结

敢于创新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所谓事业上取得成功,就是在工作中有创新、有突破,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创新,才有力量的源泉。所以,没有创新,就没有一切。大学里不仅仅是选择知识,继承知识,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创新知识。什么叫大学生?什么叫研究生?我想,有一点是根本的,能创新。办大学,不能创新,办大学干什么!!!重点大学更是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就提倡“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郑板桥歌颂“二月花”,因为“领异标新二月花”。对这点我深有感触。

我为什么能够破格升为教授,能够增选为院士呢?原因就是我把机械工程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结合起来,着重于同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 etc 等前沿领域的交叉研究,在先进制造、设备诊断、无损检测、信息处理等方面有所创新,有所贡献。没有创新,没有开拓,怎么当院士?1984年底,我与师汉民教授接受了一个研究所的钢丝绳断丝定量自动检测的课题。钢丝绳从诞生以来,在使用中就存在断丝这一问题,如何自动地定量检测出来断丝的数目,是个老大难题。现代仪器可以自动检测出来钢丝绳何处有断丝,这是定性问题,解决了。问题是断了多少根丝呢?这是定量问题,没解决,世界上也没解决。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确有些提心吊胆。但是,我们认为,现代仪器既然可以从所记录下的波形变化上判断有无断丝,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从这一波形变化大致上可估计出断了多少根丝,这就是说,断丝处的波形变化,肯定有某种反映断丝与断丝数目的特征,肯定有某种逻辑规律,我们肯定可以采取某种数学方法通过计算机的计算找出这些特征与规律来。在同研究生的日夜努力下,一年多一些,突破了,创新了,定量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外的权威期刊《材料评估》、国内最权威的期刊《中国科学》都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还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日日新,又日新,要发展,就得创新,就得创造。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如此之快,关键就在于创新,还有大量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



我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有一个指标,叫“技术依存度”,指一个国家的关键技术依赖国外的程度;希望在2020年,从目前的约50%降到30%以下。但是,工业发达国家在90年代中期,技术依存度平均为10%,美国1.6%,日本6.6%,那时的韩国为24%。显然,我国关键科技的知识产权远远不够,面对外国,我们还不能完全挺直腰杆。这个任务,我们这代完不成,下一代应该完成。

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20世纪的中国可以分为两段:上半世纪求独立。遵义会议之前,失败失败再失败;遵义会议之后,胜利胜利再胜利,直到1949年10月,赢得了一个人民共和国。下半世纪奔富强。新中国成立之初,顺利了几年,后来呢?挫折挫折大挫折,以至十年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展发展大发展,到现在发展得如此气势磅礴,奔向世界一流。为什么呢?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即确定了他的思想路线,这也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即确定了他的思想路线,这也确立了邓小平理论。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能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当前,发展成了科学发展观。

要敢于创新,当然也要善于总结。善于总结者,“以史为鉴”也,“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外国人讲,历史学是聪明学,我们讲,观今宜鉴古,以史为鉴,都是一个意思。做事,要走一步,回头看一步,走几步,回头看几步,即要从实践中认识真理,坚持真理,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绝不像一头蠢猪,一只苍蝇,瞎向前闯,不知正确方向。

三、尊重别人,依靠集体

尊重别人,依靠集体,这是成功的保证,这是成功的外部条件。现在的大科学家、大专家,干大事业,离不开集体;离开了集体,老子天下第一,那绝对什么事也做不成,一定要把人际关系处理好。我1978年时提升为副教授,1980年学校又想破格提我为教授,当时47岁,算够年轻的了。提拔青年教师,学校领导要有眼光有决心。现在,30岁刚过的教授已不是个别的,发展真快!学校到我所在教研室找了正、副两位主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问我可否胜任教授工作,两位主任都坚决讲可以。于是学校要他们整理我的材料,上报省里。当时我们学校没有权力审批教授。他们又找了一位老教授,找了党支部书记(副教授),一共四人一道整理了材料,将材料上报。要知道他们两位还是副教授,而且是我的顶头老师,教过我的课,改过我的作业,指导过我的实习,带过我的设计,我是他们的“嫡系”学生,他们也是1978年与我同时提升为副教授的。这两位教师为自己的学生升教授而努力,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学校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发展吗?最后我被评为了教授。对这一点我非常感动。1981年底,我



到美国 Wisconsin 大学 (Madison) 做高级访问学者,半年后,教研室主任也去了,而且同在一位美籍华人吴教授手下工作。我总是恭恭敬敬地称这位主任为老师,这是出于内心的尊重。吴教授很奇怪,问我:“你是教授,他是副教授,你为什么叫他老师,那么尊重他?”我把历史情况和原因讲了,吴教授很有感慨,他讲:“美国的导师和研究生之间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在校时学生对老师恭恭敬敬,毕业以后就不一定把其当老师了;在中国是传统的伦理关系,尊重老师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老师,他们把他们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所学的东西,在几周、几个月、几年内教给了学生,学生踩着老师的肩膀上去了,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值得向老师自傲?而老师倒应以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而自豪!我很钦佩牛顿,因为别人讲牛顿比笛卡尔伟大时,牛顿讲,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所以我比巨人看得更远。这是真理。

如果没有在 1980 年升为教授,我就不可能在以后的 10 年中在教授舞台上,创造业绩,也就不可能在 1991 年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这 10 年间,我写了 300 多篇论文,出了 10 本书,得了十几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励,还有 2 项专利,但这些工作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做得了吗?平均一年写 30 多篇论文,一年一本书,还有一年一个多的奖励,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能耐?而且我是党员,是君子不是小人,不搞剽窃,不搞水货,不搞“非礼”。那么成果是怎么来的?是同大家一同工作创造出的。在工作中,或许我多出了些关键学术点子,或许我带了些头,或许我多做了些学术上的组织工作,或许还可以谈其他一些“或许”,但事情是大家齐心合作干的。“人心齐,泰山移。”我们这个集体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真心实意尊重别人的劳动;二是公开承认别人的劳动;三是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这三点都做得那么自然,谁也没有做什么做作,完全出于内心。论文署名,争着署在后面;报奖,也争着不报自己或名次列后;发奖金,争着少拿,教研室的干部一般只拿平均数,甚至拿低于平均数的奖金,我也是如此。从 1991 年起,我们机械学院每 4 年就出一位院士,现在就有了 4 位院士,这就是集体的荣誉。

四、理想崇高,自强不息

理想崇高,自强不息,这是这四条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灵魂。没有崇高的理想,绝对不可能成功;没有崇高的理想,绝对不可能勤奋,不可能坚持勤奋;没有勤奋坚持,也就不可能创新;当然,没有崇高的理想,也不可能尊重别人。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爱国主义者。我家是个大家庭,在我随父亲逃难期间,父亲告诉全家:“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我们绝对不做亡国奴,不做日本的顺民。日本鬼子追上我们,我们全家自杀,投河自杀!”他教我念书,开始念的是唐诗。第一首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父亲讲:“孩子,为什么教你念这首诗?”



看到月亮,就要想到故乡,想到湖口,想到石钟山,想到故乡的同胞正在遭受日本鬼子蹂躏,我们不能忘记,千万不能忘记!”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下,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好本领以报效祖国。

人总得有点精神,人总得有人格。1994年春天,有位院士很气愤地告诉我,他所在的研究单位,有两位技术骨干跳槽,跳到外国公司去了。跳到外国公司未尝不可。问题是,他们很能干,很熟悉行业情况,熟悉我国情况,他们同外国老板一起来同我们谈判,那可厉害,比外国老板对我们还厉害。一刀宰下去,唯恐宰不准,宰不深,流血不多,比洋人宰我们厉害多了。这位院士严肃地问我:“他们算什么人?”我讲:“我们大家心中都明白!”我想,你们心中也会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总得心向神州,魂萦华夏,为祖国、为民族做些贡献吧!屈原讲得多么壮烈:“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履,更壹志兮。”

事情这么巧,那年夏天,某国一公司来我校谈判合作,应该说,谈判是有收获的。可是,令我感慨万分的是,他们来了十几位,其中几位是白人朋友,还有近十位,同我一样,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鼻子也不高,讲他们是中国人吗,那不一定,可能有外籍华人吧,总之,叫 Chinese,就一定没错,可是,这近十位 Chinese 中的几位在谈判时非常厉害,可能同那位院士讲的那两位技术骨干一样吧,总怕我们学校占了任何便宜。后来快走时,我说:我们今天的谈判是成功的。我知道我们学校跟世界一流大学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校去年的收入是一亿多元人民币,在武汉地区是第一位,在国家教委所属学校中也名列前茅;而在美国,一流大学每年的收入是 20 多亿美元,那时 1 块美元市价是 8 块多人民币,我们学校的收入约是美国一流大学的 1/150。所以我们学校的技术装备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大,研究水平远赶不上世界的一流大学。同样,中国的经济实力同美国相差很远,科技实力也赶不上美国。虽然我们国家进步很快,但同你们比较,同富国比较,我们还很穷。我是院士,是校长,工资在全校最高,但每月只有 1000 元多一点。1990 年、1992 年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有名一些的教授的工资是每月 1.5 万多新元,那时相当于 10 万元人民币。钱虽然比国外的教授少多了,但我们不愁吃穿。我能不能够不当校长而去新加坡当教授呢?这绝不能!如果我去,我们学校这 3000 多亩土地、80 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2 万学生,交给谁管呢?当然我不当校长,必定还会有其他人当校长,但其他人又跑到新加坡去了呢?推而广之,中国 12 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这样一个大国、古国的有关负责人都崇洋媚外,都跑到外国去了,能把这个国家交给外国人管吗?我们学校能交给外国人管吗?不行!这绝对不行!中国要中国人管!我们学校要中国人管!尽管我们现在同富国有较大的差距,但我们在精神上很充实,因为我们充满信心,在做一项伟大的工程,我们万众一心,抢抓机遇,进行建设。相信在 21



世纪中叶,我们学校一定能同世界一流大学争个高下,中国一定会同美国平起平坐,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年青一代一定能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困难有什么了不起?前进,改革,肯定伴随着困难!

世界历史上的古老民族,古老文明,除中国之外,有哪一个没有灭亡,或历史没有中断呢?迎着五千年的历史风雨,踏过五千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历史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加蓬勃发展,充满活力向前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有伟大的民族文化,有爱国主义,有骨气。我们在 21 世纪要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任,就必须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改革开放,并同现今时代的正确潮流相结合。

我们正面临 21 世纪的伟大事业,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呢?1981 年,我作为湖北最年轻的教授被我国派到美国去做高级访问学者。当时,我的工资每月 75 元人民币,约合 50 美元;这样,年工资才约 600 美元。而在美国呢?一位教授每年至少也有 3—5 万美元,多的达 10 万乃至 20 万美元以上。当我访问期满要回国时,有人问我:“这么低的工资,那么差的研究条件,为什么要回国?”我反问:“为什么不回国?”在我们这辈人的心中,出国就是为了回国,出国学本领,回国搞建设,理应如此。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的追求是,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有些年轻人的追求是,到公司去,到海外去,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形势不同了,主要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能否为国服务。到海外去,可以,何况,改革开放,应该到海外去学习,求得更多有用的知识,但最好是回国服务,至少应为国服务。到外国公司去,也好,可引入资金,引入技术,而不是专帮外国宰中国。钞票最多的地方或许是关键部门,何况,钞票多一点也没关系,但绝不能因自己想多一点钞票,而挖人民、挖国家的钞票。要富裕,也要饮水思源,心系华夏,服务祖国。这些可算是我人生最大、最深、最有用的体验吧。

青少年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绝不能做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世界怎么会发展?我用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中的最后三句,改两个字,献给大家:俱往矣,数风流人物,更看明朝。明天是你们的!祖国是你们的!

(演讲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共十五大与十六大代表,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现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九江学院名誉院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革命：摇晃的中国^①

张鸣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有些国民党人有忌讳有神话，有些共产党人有忌讳有神话，唯独辛亥革命的历史，两个党都有忌讳，也都有神话。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半步。

过去研究革命或者起义，尤其是改朝换代成功了的革命和起义，大抵有个套路：无非是被推翻的王朝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人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但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朝，其实不是这样。记得史学界曾经按照过去的套路，根据档案统计过辛亥前夕民变的资料，发现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民变可统计的大约有一万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委实算不上什么民变蜂起，更休谈天下大乱。朝廷新政引起的反抗，居然少得出奇，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波澜不惊。谙熟中国政治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此十分兴奋，由此预言中国的改革会十分顺利。当年的所谓民变，除了土匪和会党的扰乱之外，真正民间的骚动，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上，至于地方自治和教育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被后人渲染的“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其实只是山西少数地区干草会搅和出的小骚乱，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只消摸过辛亥前后的社会史料，凡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其实辛亥年之前中国社会相当安定。跟此前相比，很多过去匪患严重的县的知县有了自己掌握的武装，有了用洋枪装备起来的“小队子”，剿匪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地方自治的开展，乡镇一级有了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过去县里管不过来的轻微的治安案件，也得到治理。很多著名的绿林好汉，盐枭土匪，比如广西的陆荣廷，奉天的张作霖，扬州一带

^① 本文系张鸣教授2010年11月3日做客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素质大讲堂的演讲稿。